

# 林獻堂的事蹟與臺灣抗日運動對談會紀錄

編纂組

## 一、第三十次臺灣文獻學術座談會

- 一、時間：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
- 二、地點：本會主任委員室
- 三、出席：葉榮鐘、林快青
- 四、主持：張炳楠
- 五、紀錄：楊緒賢

張炳楠：溽暑之中，承蒙兩位來作這對談會，本人僅代表本會深

致謝忱。

林獻堂先生是本會的第一任主任委員，他在日據時期與日人統治搏鬥的事蹟可說是婦孺皆知的，我們今天的這個對談，就是以它為主題的，我原定的對談內容，如綱要所列：1林獻堂的家世、環境、性格，2思想及其淵源，3事蹟及其最致力的事業，4臺灣抗日運動的性質，5臺灣民族運動與抗日運動，6林獻堂與臺灣抗日運動，7林獻堂的貢獻等。但這祇是目標，對談也請不必拘執這順序。要之，只要把日據時期的林獻堂的爲人及其事業談談就是了，那麼請開始對談。

林快青：首先必須聲明的是：我未曾與林獻堂先生正式會過面，我對他的認識，僅是在日據時期曾聽過他二次的演講，讀過他所著的環球遊記，和報端雜誌有關他的各種報導或記載；以及葉榮鐘先生所編著的林獻堂先生年譜，和臺灣民族運動史等。

葉先生追隨獻堂先生凡四十年，日據時期獻堂先生有關政治社會運動的事業，葉先生幾乎全部參與其事，獻

堂先生與葉先生可說「合而爲一」，所以葉先生對獻堂先生的了解，必定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清楚。  
今天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別指定一位對獻堂先生知之最詳，也可說是「獻堂先生之一半」的葉先生，和另一個對獻堂先生素未謀面的我，來舉行這個對談，在安排上真是相當技巧的設計。

因爲我對獻堂先生沒有直接的認識，也沒有任何恩怨，所以談起來或許比較客觀，與葉先生的看法容或有些不同，如果有認識不夠之處，還請葉先生賜予指正與包涵。對談綱要中第1項林獻堂的家世、環境、性格，第2項思想及其淵源，第3項事蹟及最致力的事業，我不很清楚，請葉先生講解。

葉榮鐘：獻堂先生的祖籍是漳州，始祖石公（生於清雍正七年，卒於乾隆五十三年）十八歲時來臺，起初定居於大里杙（今臺中縣大里鄉），後來才遷徙到阿罩霧（今臺中縣霧峰鄉）。他的祖父景山公有三個兒子，即文鳳、文典、文欽。獻堂先生是文欽的兒子。文欽曾中舉人，頗負文名，在社會上稱他萬安舍是當時中部地方聞名的慈善家。造產發跡則是從石公開始。

林家在政治上之發展開始於林文察（文察爲文欽之堂兄弟）。他奉命赴大陸征剿太平天國之亂，自任主帥率五百子弟兵轉戰閩南各地，不幸於一次戰役中中伏陣亡，臨死前囑咐先鋒一景山公閒道逃亡。景山公逃至福州府報告戰役經過，並要求補助九千兩以遣返子弟兵，可是巡撫窺知林家頗富，存心勒索，反向他要求五萬兩

# 一 錄記會談對動運日抗灣臺與蹟事的堂獻林

，否則將按當時軍令：主帥陣亡，先鋒逃亡論罪當斬。景山公不服，遂被解送北京囚禁，以至於死，甚至棺材上還要掛鎖鍊，表示其罪不赦，後來岑毓英來臺灣，方了結此案。林家爲了此事，亦化費不少的金錢。

林快青：獻堂先生祖籍是漳州，渠十四歲時值乙未日軍侵占臺灣，曾隨羅太夫人帶家人四十餘口避難泉州，而不回漳州與此事是否有關？

葉榮鐘：與此事無關，當時避難泉州，主要的是爲了交通關係，本來林文欽在泉州曾散私財數千兩解決地方的分類械鬥，素來就已贏得名望。

獻堂先生出生於臺灣，在十四歲時奉祖母羅太夫人率全家四十餘口避難泉州，當時他們人地生疏，而且泉州正值鼠疫流行，死亡枕藉，尤以所携資財有限，生活所需，難以爲繼，自是凡事不得不節約儉用，歷盡折磨，獻堂先生後日處事之毅力，生活之節儉樸素，可以說是由這次經驗鍛鍊得來。

至於獻堂先生的性格，最凸出的一點是克己功夫，而且努力向上之心時時刻刻不稍鬆懈。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談：(一)獻堂先生幼時曾有口吃癖，但經長時期的自我努力，苦練，後來終於克服矯正了口吃，我在民國十年最初認識獻堂先生(按：葉先生所著「杖履追隨四十年」一文所記，作者最初認識獻堂先生是在民國七年)。

。當時獻堂先生講話較急時，仍有口吃的現象，到了他的晚年，就沒有這種現象了。(二)是他努力戒抽鴉片：當時吸食鴉片是一種應酬，富家子弟大都領有鴉片牌照這是個人一種安全措施，因爲在當時莫論聊天莫論談事情都是在「烟盤腳」接頭，若沒有鴉片牌照碰到巡查來對戶口便會發生麻煩。民國七年，我受獻堂先生資助赴東京求學，與獻堂先生同住於巢鴨的別邸，曾時常陪獻堂

先生到醫院作胃疾之治療，他久患胃下垂，有人勸其試吸鴉片可收奇效，這也是他吸食鴉片的原因。普通戒絕烟癮並不容易，尤其是富戶子弟沒有經濟上的限制更覺爲難。但他最後終能接受夫人水心女士與蔡培火先生之規勸，斷然戒絕吸食。(三)是他能節制酒量：獻堂先生並不是不嗜酒，但他的飲酒態度常引：「酒飲微醉，花看半開」爲座右銘，每遇酒宴，凡乾一杯，則另置一瓜子於棹上如果面前已置有七、八顆瓜子，就能自制，不再乾杯。(四)是他不娶妾：當時豪門富族多置妻妾，習以爲常，可是獻堂先生獨不娶妾，這固然是夫人水心女士賢慧有以使然但最主要的還是獻堂先生不縱慾，能自我約束的結果。(五)是他能吃苦：民國二十八年，獻堂先生在東京丸之內大樓地下室晚餐，不慎滑倒，左腿骨折，敷上石膏。近三個月用繩帶吊在床柱，不能動彈備受痛苦，但他却能談笑風生，研讀詩集。與親友唱酬而成海上唱和集一卷。

林快青：葉先生剛剛所舉的例子很好，可使人們對他的性格有更深刻的了解，以當時社會情況，獻堂先生出身豪門巨族而能做到戒食鴉片，不娶妾，實在難能可貴，這可能與他的教養也有关係。

葉榮鐘：這與他少年時學養有關係，他小時候的啓蒙老師是何趣庭，此人純係讀書人，國學根基相當好。

林快青：有志於學的人，在接受基礎教育後，通常都能回頭尋找，就其興趣、專長的學科再求發展。獻堂先生中年愛讀詩經，晚年喜歡作詩，由此證明獻堂先生的國學根基相當好。

葉榮鐘：獻堂先生的基本思想乃是來自儒教，但對新思想最大刺激則是受梁任公影響。光緒三十三年，獻堂先生由東京返臺，經過奈良，於旅舍邂逅梁任公，深任公並應邀於

宣統三年來到霧峰菜園五桂樓作十日之遊。當時曾對獻

堂先生說：「不可以文人終身」。並開出西洋名著一百六十餘部書名，鼓勵獻堂先生研讀。獻堂先生雖然不解外文，但以其悟性好，在東京時與林呈祿、蔡培火、黃朝琴、羅萬偉、葉清耀等人時常接觸，頗受影響。獻堂先生可以說是一個崇尚「合理主義」的人物，可從數方面來講；（一）對於祭祀祖先極為隆重，但不迷信，不信卜巫之說，在當時社會情況，這是很難得的。（二）絕對信任西醫，不信中醫，他本人如此，家眷也如此。有人說他的思想是七分基督教，三分基督教，頗有道理。他與傳教士亦有來往，如淡水馬偕傳教士、彰化蘭醫生、臺南文姑娘……均曾至霧峰受其招待。據獻堂先生所著「環球遊記」在倫敦曾遇文姑娘，並接受其茶會招待，應邀作陪者有十餘人均是住過泉州、廈門、臺灣的牧師姑娘，相聚甚歡，席間有位鍾姑娘年已七十餘，可是猶在研讀義大利文學，獻堂先生深受感動。

獻堂先生的新思想，雖然沒有系統，但他却能從各方面吸收，利用。

林快青：一般人對獻堂先生只知道「林獻堂就是林獻堂」，至於有關他的事蹟，則不太明瞭。

葉榮鐘：日據初期的同化會，以及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民衆黨以至於地方自治聯盟表面上均沒有具體的結果。至於企業方面如臺灣製麻、南洋倉庫、彰化銀行等則都是被利用掛名而已。創辦臺灣民報、新民報才算比較具體。日刊報紙臺灣新民報發刊時，臺灣總督府曾詢問他的態度，如果他能出面主辦，才允許發刊。

民國三年，他為紀念羅太夫人的壽辰，與從兄林紀堂、林烈堂及中部士紳發起捐款，創立臺中中學（今省立臺中一中的前身），已是顯然具有民族色彩的一種運動

。

成立大東信託會社，我的看法是：當時臺灣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民族運動，已由文化啓蒙運動進入經濟活動。當時臺灣人的遊資，幾乎全由日本人所利用，任由他們操縱。獻堂先生創辦大東信託會社，目的就是在針對這一點謀臺灣人的經濟出路，同時期能以此有所裨補於民族運動。但大東信託會社成立時公稱資本額雖是二百五十萬圓，但因當時臺灣尚未施行信託法，業務上、課稅上均不能享受一般金融機關的待遇，經營非常困難，獻堂先生與實際負責人陳忻為爭取信託法的實施曾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終未能實現及至二次大戰末期臺灣實施信託業法，大東信託仍須合併其他同業並由臺銀出資而變成臺灣信託公司。

林快青：日本統治臺灣，怕臺灣人發展，企業形成民族資本，所以誘導臺灣人投資於土地，因為土地資本在政治上的影響較為緩慢，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就比較容易形成政治影響力。所以大東信託會社之成立，日本人千方百計設法阻撓，規定信用組合存款一定要存入銀行，臺中州產業課的公款，也不得存入大東信託會社，甚至大東信託會社要在臺中購買原勸業銀行的舊址，也遭受日人的嚴重干涉。

葉榮鐘：獻堂先生一生念念不忘的事業，而且完全出乎他本人意志的是：中國文化的保存。保存漢文作為最重要的手段，屢次向臺灣總督建議陳情恢復公學校的漢文科，（日本昭和初年禁漢文）。關於此事有一段故事，他曾訪問平塚總務長官謂應恢復漢文，該長官曾說「漢文有必要」這句話，獻堂先生即據為口實，翌日將此消息刊載於臺灣新民報，引起了大問題，演騰一時。

霧峰一新會，原聘請莊太岳教授漢文，不久就被禁了，

## 一 錄記會談對動運動抗臺灣與蹟事的堂獻林

民國三十年請傅錫祺主講史記、唐詩，也受了日本人的干涉，後來改為「漢詩習作會」竭力傳習漢文，這是發自獻堂先生內心的意志，也是他一生中最致力的事業。

林快青：綱要中的第4項：臺灣抗日運動的性格，可歸併第5項：臺灣民族運動與抗日運動來加以探討。凡殖民地的反抗鬥爭，在最初時期，均係對新來的統治者的一種近乎自然的排斥和反抗，直到統治者以其法令，制度加諸於殖民地人民時，這種反抗運動就漸漸形成較有組織、較有體系的民族運動。在臺灣的民族運動，其對象是日本，所以就是抗日運動。後來臺灣的社會運動受到海外潮流的影響，漸漸帶有階級鬥爭的色彩，但其鬥爭對象多半仍為日本人。

葉榮鐘：文化協會分裂時，右派譴責左派說：在臺灣根本無所謂階級；如果有階級之分的話，那麼日本人不但是統治者，也是資產階級。林本源製糖會社，雖然是臺灣人的資本，也是由日本人把持的。

林快青：林本源製糖會社的創立，是不是日本人的陰謀，企圖由林本源家來開例，以便以後可照例強制收買農民的土地作為種植甘蔗的用地？

葉榮鐘：這點我不太清楚，聽說林本源家有五百萬圓寄存在上海的匯豐銀行，後來受到臺灣總督府的壓迫，收回那筆錢，投資製糖會社，另外高雄陳仲和的新興製糖會社，係利用其私人土地經營，但結果這兩家製糖會社後來都被日人合併。

當時抗日運動的動機，自然是因為臺灣人所受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最主要的是每個臺灣人內心對異族統治的反感，人同此心。不過臺灣民族運動的性格並不是硬硼硼的革命運動而是溫和的民主主義運動。當時的議會請願運動，日本政府認為是本省同胞有意脫離日本統治的準

備，或歸向祖國的前奏所以「獨立」兩字已成禁句。不過臺灣人彼此心照不宣，表面上無人敢冒此大不諱發表獨立或復歸祖國的言論。

林快青：臺灣人的民族運動以民族感情為直接動機，後來且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比如日本的自由主義、祖國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世界局勢的演變等等，產生了文化協會、民衆黨、議會設置運動、自治聯盟、文協分裂左右派、農民組合、文藝聯盟等等五花八門各色各樣之社會運動，盛極一時。

葉榮鐘：議會請願運動的理論的根據完全是以標榜四民平等的日本憲法為前提。日本既為立憲國，對臺灣人的歧視，不平等的待遇，便是違反立憲。因此我們到處演講都是以立憲政治的立場來抨擊日本的乖張措施，大受聽眾的喝采，其實講演的理論並不重要，因為我們與聽眾之間無所謂台上，台下之分，彼此的心靈都結合成為一體。

林快青：綱要第七項以「林獻堂的貢獻」作為結論，好像肯定「林獻堂的貢獻」是對談的主題，我不太贊同。假使獻堂先生對臺灣社會運動有貢獻，我們可以在綱要第6項中加以申論。

根據事蹟資料分析，剛才葉先生所說的獻堂先生是合理主義者。思想沒有系統，行動非革命的。和我的看法相同。獻堂先生在日據時期雖然是臺灣最著名的政治社會運動家，但他對政治權力似乎沒有太大野心，也不像一般政客不擇手段地作政治投機。他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也是一位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政治大哥」，（通常稱人「大哥」總帶有幾分譏笑成份，在這裡絲毫沒有這種意思）。一切運動凡是出於民族意識而且符合民族良心的，不論由誰倡導，由誰請他出面帶頭，多半他都會答應的。這種類型的人物在殖民地初期的反抗中是

不可或缺的。所謂思想家，革命家在此時期內很難統合各階層的民族力量，須要「政治大哥」出面，才能有效地結合廣泛的民族感情作為運動的後盾。獻堂先生在這段時期，是有很大的存在價值的。渠在彼時確實是臺灣人的一種symbol。我認為獻堂先生最大的貢獻是，因所謂「祖國事件」遭到日本政治流氓打了他一巴掌，其實這一巴掌很結實地打在所有臺灣人民族尊嚴的心坎上，在臺灣民族運動史上的績效甚大。日本投降後臺灣人打日本人，不穿木屐、不穿日式浴衣、不說日語等等都與獻堂先生所遭受的一巴掌有關。

蔡培火先生在「獻堂先生年譜校閱後誌」一文中，關於獻堂先生晚年寓居日本一事：培火先生認為「醫病是一面的理由」，對其離臺真正動機肯定說是「政治上不無寂寞之感」！蔡培火先生與獻堂先生的關係，在某一種意義上講，比葉先生與獻堂先生的關係或許更深，我當然不敢說蔡培火先生不了解獻堂先生，但根據分析，我實在不能苟同蔡培火先生上項說法。前面說過獻堂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智識份子，或許以他的尺寸衡量當時臺灣的情形，發覺到與他原有所想像和憧憬的有所不同，所以失望地離臺寓居日本，但他還是時時刻刻以臺灣為念。

葉榮鐘：我完全同意林先生的說法，獻堂先生地下有知，當引以為知音而安慰於九泉。

張炳楠：今天的這個對談，不但是新的形式，談的也很精彩。因為時間的關係，那麼我們就此結束，謝謝兩位。